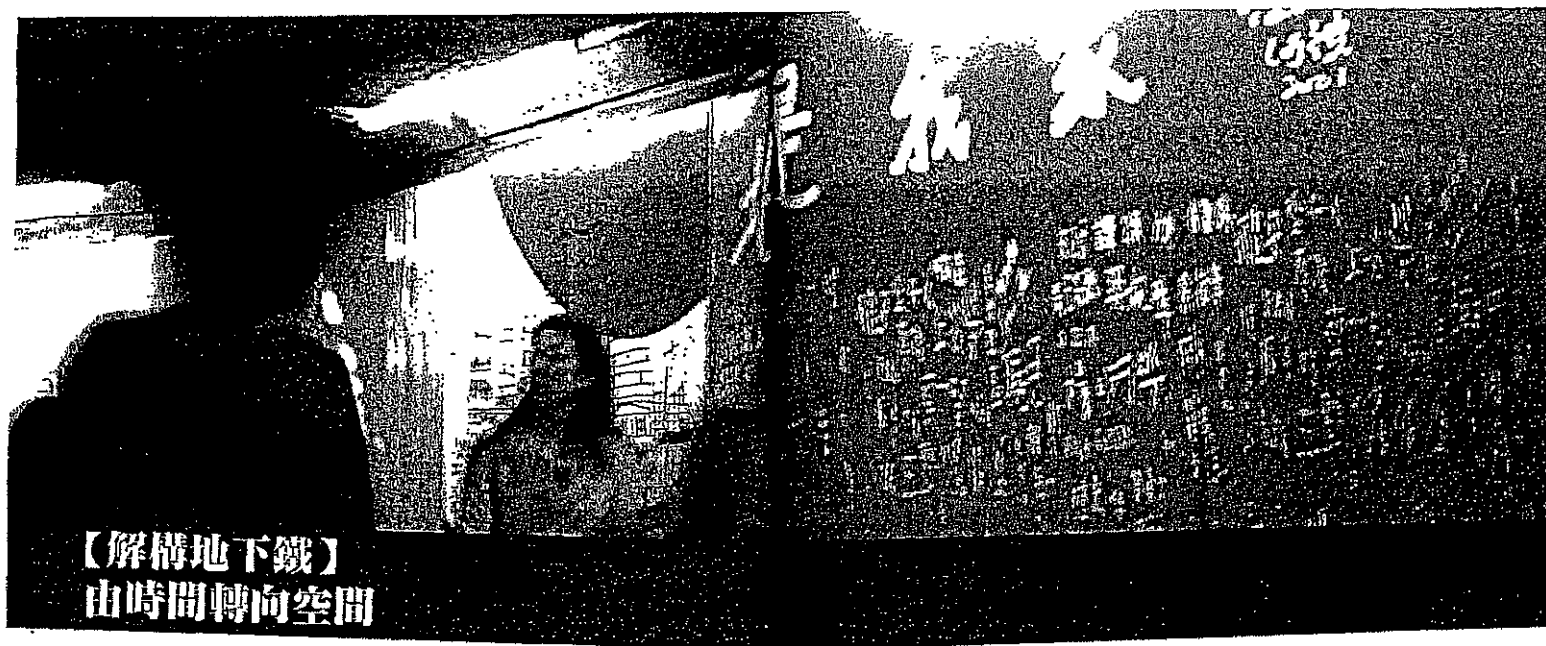


潘國靈，〈解構地下鐵——由時間轉向空間〉

潘國靈，《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香港：Kubrick，2005）。

1. 你乘坐地鐵（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時，有沒有觀察到甚麼改變？
2. 思考在地鐵車站的某些見聞或經歷，並分享你的體會。
3. 地鐵在現代化城市的功能如何？試闡述你的看法。
4. 你同意作者所歸納的地鐵「三化」現象嗎？香港地鐵的發展和轉向是好事還是壞事？
5. 通過港鐵近年一系列的廣告宣傳短片，反思地鐵與香港社會變遷的關係。



【解構地下鐵】 由時間轉向空間

導言

鐵路是現代化的標誌之一，而鐵路伸展至地下，就是我們熟悉不過的地下鐵了。最早的地鐵於一八六三年在英國倫敦出現，約四十年後巴黎也發展了地鐵系統，成了世界都會運輸系統的模範。香港的地鐵在一九七九年通車，深圳地鐵、廣州地鐵第二線二〇〇四年才通車，小小的澳門也計劃要建地鐵了。地鐵的存在，不僅是交通需要，更成了城市的標誌物。地鐵落成的年份，拉出一張城市現代化的序列。與歐洲相比，香港的地鐵還是小孩一個，但二十五年也累積了一點文化，在中國城市中，也算得上是大哥了。

地鐵是現代城市的動脈。地鐵的設計也反映一個城市的精神氣質。一些國家的地下鐵入口是很有設計意念的。巴黎深綠色青銅鑄造的地鐵站，曾經是「新藝術」

（Art Nouveau）設計運動的啟動作品。西班牙畢堡地下鐵道入口，請來大師Norman Foster設計，以透明玻璃筒形式構建。倫敦地鐵站有點殘舊，但Charing Cross地鐵站的壁畫還是不落俗套。香港的地鐵站比較四平八穩，但也並非毫無風格，曾經看過尖沙咀一個地鐵站入口被粉飾成一個杯麵廣告站台，煞是有趣，如果你對普普藝術不反感，這也可算是一件裝置藝術品。

此外還有人。地鐵車廂內，是幕幕的眾生相。多少人打瞌睡，多少人看報紙，多少人看書，人們的步速，有沒有你推我撞，幾乎可以從中窺探一個城市的精神面貌。所以，每到一個城市旅行，我也愛看看當地的地鐵站。而要瞭解自身城市，地鐵站有值得解構的價值。

* * *

一個女子在手機通話中向男友撒謊，說自己身在美術館，但原來她正在地鐵站中，與同在地鐵站的男友撞個正著，鏡頭拉遠，原來地鐵站真有幾分美術館feel，這是新近一個地鐵官方廣告。跟八十年代家傳戶曉的地鐵廣告「話咁快就到」（還記得廣告裡那一捺風嗎？）相比，其間明顯看到由時間至空間的軸心轉向。

時間，或者說速度，是現代性的，功能性的，曾幾何時是作為城市新事物的地鐵所標榜的，而現在，當速度已成為基本要求時，在這個品味消費年代，打造空間已經成為一個新方向。以往地鐵站僅被視為一條人流輸送帶的年代已經過去，地鐵二十五周年的口號「聯繫交通，更聯繫生活」正好道出這點，唯有在空間上入手，才可使一個交通網絡，附加生活場所的意義。箇中變化，與香港後現代商品發展邏輯密不可分。

媒體化

今天，說地鐵站是一個媒體浴場，並不為過。地鐵站的媒體化，九十年代來了一個大躍進，這跟廣告物料技術的發展相關，隨貼隨剝巨型廣告畫的技術突破，將地鐵站帶入我稱之為「牆紙廣告」的年代。當然，這跟九十年代消費主義抬頭息息相關，但物質與文化的關係，也不容忽略。

在「前牆紙廣告」年代，地鐵站基本上無景觀可言，不同的顏色與地鐵的搭配主要是功能性的（識別作用）。現在，甫從地面走進地鐵站，你即被重重的廣告包圍，

沿電梯兩側的小幅廣告只屬小兒科，更令人暈眩的是覆蓋牆身、柱體、車廂的廣告畫、月台上一整列或動或靜的廣告，已達無孔不入的侵入（intrusive）程度。發放「資訊」的電子屏幕不斷增生。電子媒體外，又有免費刊物派發，如果以往的《招職》、《去街Guide》只是借地鐵站作散發點的話，二〇〇二年推出的《都市日報》便是一份地鐵刊物，像歐美地鐵刊物Metro（英文名字也一樣），成了不少上班族的精神食糧。地鐵站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廣告平台，及「資訊」發放的多站據點。屏幕的增生、廣告視覺元素的過剩（excessive），都是後現代社會的景觀特徵，香港地鐵站是後現代景觀的縮影，比起世界不少大城市如巴黎，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商場化

地鐵站也再不只是乘客穿梭往來的瞬間站台。近年來，地鐵站空間，特別是中環、尖沙咀、旺角等黃金旺站，有明顯的商場化轉向。地鐵打造它們獨有的mtrshops，標榜「生活消閒一刻」，於地鐵站內我們可以找到速遞公司、麵包店、便利店、西餅店、銀行、汽水機、快餐店、咖啡店。地鐵公司標榜「名店逐一進駐」，招標的商店種類，包括潮流服飾及精品、保健及美容產品、運動用品、影音光碟、旅遊服務、修鞋配匙、電腦軟件及配件、外賣飲食。其中，星巴克咖啡店的進駐最具象徵意義，它正式標示著地鐵空間，由過客空間轉變成可以停駐歇息的空間。但地鐵站作為商場，本身就帶有矛盾性，它人流量高，但流動的速度也高；從交通角色考慮，人群不宜集結，但站在商戶利益角度，能夠吸

引你多留一會才是好事。結果，這種過渡商場便誕生出矛盾的宣傳語句：「生活消閒一刻」（消閒本來就不應是一刻吧），對於行色匆匆、慣於忙裡偷閒的香港人，這語句卻道出香港人的矛盾特性。

品味化

曾幾何時，地鐵誇示的是其功能性強項：速度。看看其名字：Mass Transit Railway，大量的運輸鐵路，本來就極之功能性，無甚感性可言（不同地方的地下鐵有不同稱呼，譬如台灣叫捷運、巴黎叫metro、倫敦叫Tube，香港名稱與新加坡MRT最接近）。但進入後工業社會，單單誇示現代化功能，已然不足。服務性行業、高科技商品（地鐵也是high-tech交通工具），都岌岌於打造感性的軟性形象。

多得幾米，一向予人冷漠感覺的高科技交通工具，被扭轉成感性浪漫的符號，攀登前所未有的溫情指標，足見大眾化繪本的普及力量。香港的地下鐵亦捉緊時機，推出幾米地下鐵紀念品，並「食住條水」，自行推出「小克crossover地鐵」繪本（又是crossover），炮製於地下鐵暗生的情懷。

品味空間的打造，亦見於地鐵站的空間藝術化——除商業廣告外騰出少量空間展出畫作及藝術品，又在某些地鐵站展出「社區藝術作品」，強化社區形象，予人一種更人性化的味道。當然，藝術感的經營是相當規範化的，譬如說，反映年輕人文化的紐約地鐵塗鴉，在香港

港若不是被視為破壞行為，就只能是被商業收編的行為。巴黎地鐵的流浪藝人當然也是看不見的，自然也沒有它的烏煙瘴氣。

反過來說，一些潮流商店，在命名以至裝潢設計上，都以地鐵站為模仿對象（譬如米蘭站、重慶站等），這多少亦反映出地鐵站超越純功能性，成為時尚指標。

結語

拉闊來看，由速度至空間的軸心轉向，除地鐵之外，亦可見於兩「大」快餐店；快餐店最初就是標榜其速度的（此之謂「快餐」），但近年快餐店的翻新設計，明顯是空間品味的提昇，如杜汶澤所言：「係時候有更高既要求。」這種轉向，其實就是一個城市由現代性過渡至後現代性的表徵。大家樂廣告以地下鐵為場景，看來便並非偶然。

我們當然知道，這種品味感性離我們的真實地鐵生活甚遠。真實的經驗是，地鐵很擠、人們你推我撞很沒禮貌、人們無精打采神情冷漠，但商品的形象打造，從來不需要符合現實，正如幾米於澳門舉辦的展覽名稱——方寸中的夢想飛行，後現代商品必須令人有夢想的空間（超出純功能主義），即使你明明知道它是騙人的。

龍應台，〈大河就是大河〉

〈端傳媒〉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18-opinion-lung-ying-tai/>

1. 作者說，“歌的意義轉換，歌的溫柔力度強於刀劍……”(頁 2) 你同意嗎？
2. 你的啟蒙歌是什麼？
3. 作者認為，“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你同意嗎？

龍應台：大河就是大河

當《我的祖國》歌聲在龍應台的香港演講現場響起，她本人這樣理解。

2016-12-18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18-opinion-lung-ying-tai/>

編按：台灣前文化部長，著名作家龍應台今年 10 月在香港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詢問現場觀眾「你的啟蒙歌曲是什麼」。在場的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答道，是他上大學時師兄教唱的，中國大陸老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龍應台回問是否記得怎麼唱，周偉立便和現場許多觀眾合唱了這首，富有濃厚愛國主義色彩的歌謠。這段演講過程的影片，近日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開來，捲起或驕傲感動、或而不解、或而戲謔嘲諷的種種情緒。共青團中央微博說合唱讓人「看哭了」，也有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聽眾會唱這首「紅歌」，更有許多大陸網民為「台灣的龍部長被紅歌打臉」叫好。一首即席合唱，能勾起如此分歧的反應，正凸顯出當前兩岸三地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緒。而當事人龍應台又如何看待那天晚上的情境？在這篇來稿中，她提供自己的現身說法。

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之前，我特別對身邊台灣和香港朋友們做了「微調查」，問他們：「你的啟蒙歌是什麼？」「啟蒙」，不一定得是兒時聽到學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麼歌對你自己的成長歷程有著特別的意義。

幾乎每一個人都得認真地想一想才給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樣。在台灣，老一輩的，也許會說出一首抗日時期的愛國歌曲，譬如《家在山那邊》或者 1945 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謠。年輕的有的提到像《橄欖樹》這類的校園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躍當下的周杰倫。

香港的朋友，一番沈吟之後，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幾個朋友選的都是約翰列儂的 *Imagine*。那充滿人道主義理想色彩的歌，感動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這首歌，藍儂自己說，內容「幾乎就是個共產主義宣言。」

於是我最後決定，演講就從幾首歌詞內容經過多重意義轉換的外文歌曲說起。尤其是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從農民的耕作民謠轉換成游擊隊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過電影的力量風靡了整個中國，而今天又為伊朗抗議者所用。

1940 年代為了紀念被國民政府鎮壓而遇難的學生所寫的歌，輾轉到台灣變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步向刑場前的告別哀歌。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集體記憶接軌而產生完全不同於初衷的意義，但是每一個意義都是真實的。

7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禮堂當天是滿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陸生，少許台灣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聽眾合唱了好幾首歌，台灣人用國語合唱《綠島小夜曲》，一首包裝在愛情裡的政治抗議歌；香港人用粵語合唱《友誼之光》，兩曲其實是同一首歌。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台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而香港正處在一個內心無比糾結的時代，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麼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裡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可是這首歌我沒聽過——我想聽，而且這一半陸人一半港人的場內，各自都有自己堅持的信念和立場，聽一首對方深愛但是自己不識的歌，不是最好的傾聽嗎？演講的最終目的，其實不在於講，而在於傾聽。

我的念頭全部都在一瞬間閃現：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確不正確，讓我們聽聽這首歌吧。於是我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

聽眾開始唱時還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優美有一種感染力，一會兒就唱開了。歌聲流蕩，化解心中原有塊壘，坐在一旁不相識的人在唱歌時相視而笑，是多麼美好的事，我於是讓大家合唱的時間拉長一點，雖然演講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裡，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裡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裡，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帶出來的個人記憶當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戀，可能是家國情懷，可能是某種不堪回首，可能什麼都沒有，就是那簡單美麗的旋律；那是非常純淨的幾分鐘。

歌的意義會轉換，歌的溫柔力道強於刀劍，正好是我整個演講的核心。

當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被切出一個碎片，然後那純淨自然、敞開傾聽的片刻突然變成一個刀光劍影的東西，我只能說，這樣充滿猜疑地活著，不累嗎？

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張帝莊 〈石硤尾浴火重生〉

《美荷樓記—屋邨歲月鄰里之情》（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頁 27-31。

1. 作者說：「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美荷樓。」你心裏的美荷樓又是怎樣的呢？
2. 作者在文中將人分問別類，從而簡化一個時代的特徵。你又覺得「千禧後」又有何特徵？

前言

石硤尾 浴火重生

張帝莊

美荷樓是碩果僅存的「日」型徙置大廈，
不僅見證着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更見證着
不同年代香港人生活和發展的故事。



半世紀有多前的五十年代，整個世界都在劫火後重新建設。

一九五三年，史太林死了；不久，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迎娶了賈琳蓮，舉行了盛大的婚禮。這一年的一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發明了氫氣彈，威力十倍於原子彈；七月，被稱為「二次大戰後冷戰時代的第一場熱戰」的韓戰，終於結束；韓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這一年，後來成為「個年代符號」的瑪麗蓮夢露在《花花公子》上拍下了一幀裸照；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錄下了他第一首作品，兩年後，他成了全世界最紅的藝人。

混亂的時代

捷克作家兼前總統哈維爾說：「五十年代是一個混亂的時期：史太林的統治已經結束；匈牙利正進行流血革命……沒有人知道世界會向甚麼方向發展，甚麼還適用，哪些已不再適用，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看待這一切。」

五十年代，是一個人類剛經歷過最可怕戰爭的年代，許多國家誕生了；然而，更多國家在劫後餘生後艱難重建。偏偏在這樣一個全球籠罩在核戰陰霾、災後重建、難民流徙、饑饉貧窮的年代，大眾娛樂產品突然大規模出現：電視、搖滾樂和以「未來世界」為賣點的美國迪士尼樂園。

雖然這些娛樂產品在美國興起時，太平洋一邊，中國南端一個與大陸分隔的城市

木屋居民，並未感受到這一切；然而，十年之後，他們一定會驚歎，世界變化之大，有時比最傑出的科幻小說更離奇。搖滾、電視、青少年文化，很快在六十年代瘋魔了全世界。真正的新世代就是在這些產品問世之後同步誕生。

借來的時間

「二次大戰後，全世界都在療傷」中國進入了國共內戰時期，大批中國人南逃至港。五十年代，許多人在山頭野嶺用鐵皮和木板搭起了臨時棲息的房屋。惡劣的居住環境，頻仍的風災和致命的火災，都驅趕不了他們；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相信，世局稍定，一定會回到他們心目中那個理想的故鄉。這裏，不過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夜，石硤尾發生大火，一夜之間，石硤尾大片房屋被焚毀，五萬七千多人痛失家園，大部分人都只能露宿街頭。香港政府第一次介入了本地居民的住屋問題。工務局火速在原址興建了兩層高的平房，安置部分災民，徙置事務處隨即在石硤尾興建首批七層高的徙置大廈。這批鋼筋混凝土構架建築物落成，宣告香港公共房屋政策正式落實執行。

「香港人」誕生

石硤尾大火同時標誌香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場大火和公共房屋政策之前，大

部分香港居民其實保留著一種「過客」心態；奇妙的是，公共房屋政策推行後，「香港人」意識慢慢抬頭。從這個意義來說，「香港人」的故事，其實開始於一九五三年的這場石硤尾大火。

要認識真正的香港和從香港發展出來的核心價值，不必上溯到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而應着眼於五十年代以後香港居民以及當時的青少年如何安身立命、逆境求存、創造機遇，以至最終改變命運。

石硤尾第一批公屋落成至今逾半世紀，其中在一九五四年十月落成的美荷樓，經歷多年風雨，保留至今，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口」型徙置大廈。經活化保育的美荷樓，將繼續見證香港未來的命運。

如果要介紹美荷樓，也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香港人」正是在這裏誕生的。正是在這個地方，「上海人」、「潮州人」、「客家人」和「福建人」變成了同舟共濟、無畏也無懼的「香港人」。事隔五十年，這是一個回望「香港故事」以及「香港人故事」的最理想地點，因為美荷樓正是這一切傳奇的「活見證」。

夢想的片段

今天，我們或許有許多學者用各種角度，分析香港在五十年代以後起飛的各種理由

和背景。然而，作為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我們較少用一個投入的態度，代入當時那一代香港人的故事裏，去體現、回味那個年代的內在情懷。當我們訪問那些曾在不同年代居住在石硤尾的香港人，我們得到的不是硬梆梆的分析性資料，而是一個個動人的畫面，一次次觸動內心的震動，這些故事，構成了香港的起飛。

幾十年前的某一刻，一個幾乎被人用鑊水毀容的男孩在月下寫詩，這個詩人夢想成為電影導演，他能實現他的夢想嗎？幾十年前的某一刻，一個女孩在走廊的微燈下閱讀，她憧憬着一個怎樣的未來？幾十年前的某一刻，一個男孩一腳踢破了一道大門，好勇鬥狠的他，最終能否把旺盛的精力轉化為成功的毅力，甚至成為一代拳王？幾十年前的某一刻，因水浸被困屋頂的愛國少年，怔怔望著遠方發呆，為社會的不公義而吶喊，他最終有沒有放棄他的理想？幾十年前的某一刻，七個女孩在「水喉腳」附近結義金蘭，今天她們的諾言還能兌現嗎？幾十年前的某一刻，一個在這裏長大的男生戰戰兢兢步進了女朋友位於山頂的豪華大宅，他們家世懸殊，兩人真的能有情人終成眷屬嗎？

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座美荷樓

一幢幢石硤尾公屋，書寫着一篇篇香港人生活的故事。香港的價值在哪裏？香港的價值就在這裏。如果我們忘記過去曾有過這樣的那樣的「某一刻」，我們的人生就終結了。

在許多個訪談中，教我們記得的，也許不是大道理，而是一些小片段。這些片段見證着過去半世紀香港人走過的道路。有時是一些嚙語，有時是一些幸運，有時是一些玩笑，有時是一些血淚，有時是一些關懷，有時是一些體諒，有時是一些堅持，有時是一些毅力，有時是一些愛。

有時我們把人分門別類，分成「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者「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因為這能簡化一個時代的特徵，從而作出理論上的總結和評估；然而，時代容或不同，人的情理並無二致。

人本來就是共通的：大家都是整體的一分子。從不同的人身上，我們總會看到自己。美荷樓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們的故事。

美荷樓的記憶，其實就是我們的記憶。

龍應台《誰是香港人》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 年）

1. 為何作者在文中提出「香港不是沒有當代文化史的」？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2. 何以作者會在文中說：「真實的香港和電影的香港，距離很大」？你認同這一說法嗎？
3. 作者在篇中提到「有沒有所謂『典型香港人』這個東西？」你對這個問題有甚麼看法？
4. 本篇收筆時提到「我納悶的是：『蘇絲黃』和錢穆這兩個『香港人』怎麼溝通啊？」作者想要指出有關香港人的甚麼特點？

誰是香港人？

來到香港之後，我就開始不斷地倒帶。好像小時候看的電影，長大了之後回頭去看，想理解當年無法理解的事情。影帶往回倒，定格，找細節。每一個細節都帶來驚詫。

當年眼中「國語很整腳，舉止很奇怪，看起來既不像中國人，又不像外國人，無法分類」的「香港僑生」，現在我睜大眼睛看分明了：他們是主管香港廣播的邵廬善，是總裁東方報業集團的何文翰，是總編《亞洲週刊》的邱立本，是大散文家董橋，是瀟灑狂放的才子馬家輝和梁文道。香港的文化，有半壁江山在這些「怪裏怪氣」的香港僑生手中撐起。

認識了香港之後，突然發現了很多好朋友的另一面：經營「台北故事館」的律師陳國慈，把文化品味帶進台北的市井生活，是香港拔萃女書院的畢業生。看起來瘦弱羞怯的林百里，憑空打下世界的電腦製造業江山，是新界大埔墟長大的小男

孩。為台北藝術發展奔走呼籲的蕭麗紅，是嘉諾撒聖心書院的學生。寫詩的席慕蓉，今天還能悠悠背誦完整的《琵琶行》，用漂亮的廣東話，因為那是在香港讀小學時老師教的。

香港不是沒有當代文化史的。

當年想像的香港，背景是油麻地廟街，前景是黑道殺手在奔跑。不知為何叫「油麻地」，但是看見地面因為夜市的蒸煮煎炒潑灑而油膩膩、黏糊糊、髒兮兮，覺得「油麻地」這地方果真很「油麻」，名字取得好。小混混大流氓總是在麵攤上突然竄起，要不被人追打，要不相互殘殺，總之就是在又麻又油的市井周遭裏打砸一通，鬧個人仰馬翻，狗血噴頭，然後響起警笛呼嘯。

《無間道》的流行，大概就像一個得獎銅牌再度用油刷個晶亮，「油麻」香港印象深植人心。日前邀姪兒來香港玩，這十六歲的台灣少年搖搖頭認真地說，「好危險的地方啊，滿街都是黑道，不是嗎？」

我瞠目結舌，但是想到自己當年的愚昧，倒是噗嗤笑了出聲。

「黑道」都躲在哪裏呢？走在街上可看不見。倒是在重慶大廈對面，我曾經

站在那兒，真的站了很久，看着這棟老舊不堪的大樓，夾在熱鬧閃亮的商業大樓之間，城府很深，像一個落魄頹唐的江湖老大，坐在喧嘩無知的群眾裏，獨自喝着悶酒。各色人種從重慶大廈的跨間進進出出，有一種鬼祟的氣氛。你也知道，這大廈裏頭賣淫的正在賣淫，走私的正在走私，詐欺的正在詐欺，殺人的正在殺人，絕望的正在墮入深淵，勇敢的正在相互勉勵，自殺的正在做最後的告解。當警察出現，運出一具不好看的屍體時，人們並不驚訝。

站在重慶大廈對街，可以看見這個城市的靈魂幽暗處，既英雄，又邪惡。

但是，香港仍是一個光明安全的城市。包藏着七百萬人的龍蛇雜處，我敢讓十五歲的兒子在週末的清晨一點，獨自搭車回家。每次等到他回來，為他掌燈開門，我就感謝這個城市，感謝它給作兒子的自由，給作母親的安心。

真實的香港和電影的香港，距離很大。

倒帶到從前對「香港人」的印象：李小龍、蘇絲黃、楚留香、被綁架的港商、被跟蹤的港星……不對啊，可還有錢穆、徐復觀、胡秋原、張愛玲、蔡元培、許地山，加上在上環老城「專賣魚鮮乾貨的街道跑腿、送貨、搬東西」的苦力表哥，這

幾種截然不同的印象，怎麼調和呢？有沒有所謂「典型香港人」這個東西？如果有，他長甚麼樣子？他應該來自中環還是新界？深水埗還是半山？她應該是鵝頸橋下打小人的巫婆還是在淺水灣飲英國下午茶的高級貴婦人？白襯衫綴着袖扣、英語帶倫敦腔的「高級華人」還是在二樓書店買《資治通鑑》的文人？

我納悶的是：「蘇絲黃」和錢穆這兩個「香港人」怎麼溝通啊？

劉天賜，〈港武俠劇的靈魂與改編要素〉

《明報月刊》2017 年 5 月

1. 武俠小說乃「成人的童話」，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2. 為什麼武俠小說可以歷久不衰？
3. 「江湖」，是中國文化匯聚的地方。今天，我們身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江湖」？

港武俠劇的靈魂與改編要素

劉天賜

除了好技術、造型，把武俠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命脈還繫於好的編劇。編寫武俠影視作品的編劇，都要滿腦子「江湖知識」、俠士情操，能洞悉世間人情世故，方能編寫出好的武俠劇。

香港電視台拍了相當多武俠劇集，但武俠劇與技擊拳腳或刀劍片集各有不同，武俠不只是武打動作劇，而是包含崇高的主題思想，即中國固有的俠義思想。這俠義思想表揚從春秋戰國俠客高士流傳下來的「義」，它與孟子所言之義有些不同，俠義之「義」，乃對別人的一項承諾，必定執行，至死不渝，且不自居功，完成義舉，默默離開。這些俠義故事，一直在民

間流傳下來，並且得到普羅大眾以及市井雞鳴狗盜之流敬仰，以至成為市井行事的一種意識形態。

這些傳說故事經過歷朝的改造修飾，成了榕樹頭講故事的本子、瓦舍勾欄中唱曲的曲本，亦有文人寫成話本、小說流傳下來。近百年，這些傳說故事漸有市場，造就了武俠小說這一種小說文體。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次於澳門的吳陳比試中

國功夫，尤其引起廣大群眾的興趣，梁羽生、金庸兩位大師於是舉筆正式撰寫長篇的現代武俠小說，在報章上連載，成為了香港市民日常的精神食糧。

俠義之心與俠者的浪漫

究竟武俠小說或武俠類作品吸引受眾之處在於什麼？

有說是「俠義之心」。「俠義之心」是眾人所景仰的。嘿！但可惜除了少數知者了解江湖之「義」外，現實中還有多少人珍惜這不矜功、不誇功、不恃功的品德呢？大家都搶住爭功呢！

亦有說吸引力在「俠者的浪漫」。純淨俠義故事比較枯燥，武俠類作品多營造浪漫氣氛。尤其為吸引廣大青年男女受眾，必須加入愛情元素。但單加入平凡的愛情情節也不夠，更要夾雜些凶險、艱難的元素，處境永遠在生死一線之險地。如此，製作者就能成功呈現出浪漫、刺激的處境與經歷，令到受眾猶如處身於一種未能經歷，但又極想體驗的「浪漫」之中。華羅庚先生形容武俠小說乃「成人的童話」，此言確實看得通透。

把武俠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面對的難題，第一，當然在技術上。文字不同畫面，文字之中蘊藏了很多想像空間，要把

所寫事物呈現出來，實不容易。例如輕功，不只是「吊絲」（鋼絲）、「跳彈牀」便能表現得了，更需兼顧節奏等配合。且各門各派輕功都有特色，故此，動作指導（前稱武術指導）需大費心思把受眾腦海想像的情景化作具體可見的「幻覺」。有些指導甚至親身持攝影機拍攝，因為他腦海出現的畫面，不能透過口中詞彙完整描述出來，只有親身拍攝才能準確表達到。因此，動作指導與攝影師也有曾因誤會交惡的。

第二，人物造型更是一項大考驗。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必定以「奇」、「怪」取勝。不同一般平民百姓，不同於傳統的戲劇、舞台人物的打扮與造型。好些有歷史背景的故事，更加「考人」，既要符合歷史，亦要有武俠人物性格的暗示。例如金庸《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是少數民族少女，不單止，且是極之脫俗而純潔的少女，而看畫面更是嗅不到小說所述其身上散發的花香的，這怎「拍」出來？哪位少女演員可飾演此純潔姑娘？大問題呀！

另有一位，也是金庸《神鵰俠侶》中的女主角——小龍女，這位楊過的「姑姑」真是女神一般，只應見於描寫引發的想像中。那時插圖大師雲君先生所繪具體

的畫像，也許已最近原著。而人物造型有神似、形似之分，主角神似，配角形似，整體不能離原著精神。如小龍女不能肥胖，面形胖一點，便被譏笑為「小龍包」了，看過香港各電視台改編金庸《神鵰俠侶》製作的劇集，小龍女形象仍以陳玉蓮所飾演的最為神似而又形似。

一套武俠劇之成功，派角也很重要，選角不合適便廢了大半武功了。如果作品曾經拍過，今重選新人再拍新劇，便更加考功夫了。珠玉在前，不能超過，有所比較，負面宣傳力量更大。

最後，編劇仍

然是把武俠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命脈所在。無綫電視當年的「殺招」，是古往今來的連續劇「神技」，兩個字——「懸念」！章回小說每一回結尾有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情節發展到最吸引人之處，猶如出了一個謎語，受眾投入其中，則急切要求答案，但作者偏偏在此關鍵時刻，故意拖延、隱藏，故弄玄



香港各電視台改編金庸《神鵰俠侶》的劇集中小龍女形象，仍以陳玉蓮所飾演的最為神似而又形似。（資料圖片）

虛，令受眾心癢癢，心更急。這樣「玩弄」受眾情緒，正好是寫商業劇本的絕招呢！好的編劇自然能充分掌握這「神技」。

所有戲劇，皆依照人物性格而發展劇情，武俠作品也不能例外。改編必然改動某些情節，可是，主要人物性格不能改動。優秀的小說，必定設置了別出心裁的人物性格，人物之間，往往會引起性格上不能避免的衝突，產生了矛盾，便是受眾喜愛看到的戲劇情節。

武俠作品背景是「江湖」，是中國文化匯聚的地方，具體在哪裏？說不準，但中國人心目中的確有「江湖」存在，內具江湖的規則、倫理（輩份禮儀），亦有種種的江湖幫派組織，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很多有形無形的東西，如各幫派的老規矩、習慣，又可見諸現實。

編寫武俠影視作品的編劇，都要滿腦子「江湖知識」、俠士情操，能洞悉世間人情世故，方能編寫出好的武俠劇。

（作者是香港資深媒體人。）

周保松，〈年少讀書舊事〉

《在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1. 作者說：「這些作品，一旦進入你的生命，就會成為你的情感和審美結構的一部份，並在最深意義上構成你的自我。」這句話是甚麼意思？試加以析述。
2. 請和同學分享你的閱讀經歷，並推介一本不容錯過的好書。
3. 你認為現時香港人的閱讀風氣和二十年前相比是否有很大的變化？

過的書，不知不覺走進你的生命，鋪成你的底蘊，並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滋潤你的生活，豐富你的情感，並默默引領你前行。

閱讀的美好，就在這裏。

年少讀書舊事

我1985年移民香港，1987年考進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還記得初入何官，最大的感受，是學校有自己的圖書館。圖書館不算大，藏書也不算多，但對我來說已是天堂，因為之前在大角咀讀的高雷中學，只有一層樓，地下是賣鋼材的店鋪，連校舍也談不上，完全沒有讀書的環境。

學校圖書館借書的人不多，裏面有木造的長書桌，有各種綠色小盆栽，午後還有陽光穿過窗口，照在書架上，生出不同光影。我那時因為各種原因，活得很憂傷，讀課外書成了最大的寄託。

放學後，我常常一個人坐在圖書館一角靜靜看書，直到學校關門，然後迎着黃昏，帶着書的餘韻，坐車回深水埗的家。現在憶及這些零碎片段，我就會想起岩井俊二導演的《情書》裏面圖書館的幾幕——那些色調和情懷，總能在我的閱讀時光裏找到線索和共鳴。

我那時讀書很雜，純粹出於興趣，不會考慮讀這些課外書有甚麼用。我當時的生活，其實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和別同學一起上課下課、做功課、背書和考試的世界，另一個是完全屬於自己的閱讀世界。

這兩個世界偶有交集，例如出於對歷史的興趣，我會讀柏楊的《中國人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和王曾才的

《西洋近代史》，這些閱讀和我當時修的「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目相關，但即使如此，關係也不是很大，因為用來考試的「歷史」和用來滿足好奇心的「歷史」，往往是兩回事。

大部份時候，這兩個世界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我很少和老師及同學分享自己讀過甚麼課外書，甚至壓根兒沒想過要做這件事，畢竟讀武俠、愛情和偵探小說，還是會被人視為無心向學，甚至招來一些壓力。但物以類聚，我總喜歡在圖書館默默留意那些喜歡閱讀的同學，並暗暗引為同道。去到中四時，我和六七位同學辦了個讀書小組，定期聚會，還出版過兩期手寫的《求索》小刊物，自行影印釘裝，在很小的同學圈子流傳。

除了學校圖書館，我很快發現學校附近還有一個更大的閱讀天地，那就是位於培正道的九龍中央圖書館（後來改稱為「九龍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樓高十二層，是九龍區藏書最豐的公共圖書館，我第一次去借書時，真覺得那是個天堂一樣的地方。我其後幾年的閱讀養分，不少都從這裏獲取。

最近這幾年，我開始明白，公共圖書館的設計、藏書和功能，對一個社會公共文化和公民意識的發展，可以有重要作用。正因為此，圖書館讓我們看到甚麼和不看到甚麼，推廣甚麼和不推廣甚麼，都有許多故事在背後。這是後話。

我當時讀過一些甚麼書呢？記憶已經有點模糊，加上沒有記錄，實在很難逐一細數。但我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武俠小說。我基本上將金庸、梁羽生、古龍所有著作完整地讀了一遍，部份甚至看過好幾回。我是徹底的金庸迷，早在移民香港前，已在老家的地下租書店偷偷讀過他的作品，例如《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初到香港時，我最大的快樂，就是知道原來不用錢也可以讀到金庸。

金庸對我有多大影響，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沉迷到不能自拔。我仍然記得讀完《鹿鼎記》，知道這是金庸封筆之作時，真是有無盡悵惘，覺得從此再沒金庸可讀是人生最大遺憾。我甚至固執地認為，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讀金庸的和不讀金庸的。當然，如果有人告訴我他還認識梁羽生《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和雲蕾，我會更加高興。

我後來上到大學做學生報編輯，第一件事就是策劃了一個金庸武俠小說研討會，請來幾位中文系老師主講，包括陳永明和楊鍾基老師，吸引許多同道中人。金庸小說給我最多的，是一種人格教育。郭靖、楊過、喬峰，才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而不是譚詠麟和張國榮。而「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更是不知不覺深印在心，從此難忘。

第二類是台灣當代文學，尤其是小說和散文。瓊瑤、白先勇、琦君、三毛、余光中、陳之藩、張曉風、黃春明、司馬中原等，都是借來就讀，讀完如果喜歡，我還會找來同一

作者的其他作品繼續讀，直到讀齊為止。(是的，我是一個讀完瓊瑤全集的男生。)

在那麼多書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司馬中原的《啼鳴鳥》。那是一本以台灣六十年代東海大學為背景的青年成長小說，知道的人很少。我讀了這書多次，並為其中的理想主義深深打動，因而對未來的大學生活充滿期待。我當時甚至想過，讀完中學就去報考東海大學，可惜由於我居港未滿七年，沒有資格應考。今年暑假，我應邀去東海大學住了一星期，終於得見著名的路思義教堂，並在熟悉的文理大道散步，遙想當年男女主角在大度山的種種故事，算是圓了當年的夢。

為甚麼我會如此着迷台灣作家，卻對深受其他同學歡迎的香港作家如倪匡、亦舒和李碧華等提不起興趣？我現在猜度，那主要是因為，台灣現代文學整體呈現出來的那份人文關懷和生命情調，以及揮之不去的去國鄉愁，是我潛意識裏深深認同的。作為新移民，我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安頓。我到現在仍然記得，當年讀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和《千里懷人月在峰》，還有張曉風編的《親親》和《蜜蜜》時，那份無法言說的感動。

在那個世界，有溫柔敦厚，有關懷，有愛；而那個世界，離我真實生活的世界，很遠。如此遠卻又如此美好，遂成為我精神生活的烏托邦。

最近這幾年，因緣際會，我有機會和白先勇、李歐梵、林懷民、吳念真等前輩接觸相處，近距離感受他們的行事為人，更加印證我當年的讀書體會。直到現在，我仍然很感激

這些台灣作家——是他們的作品，滋潤安慰了我初到香港時彷徨無助的心。

第三類是中國文學，包括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周作人、朱自清、張愛玲，也包括古代的陶淵明、李白、柳宗元、李煜、蘇東坡、辛棄疾、柳永、李清照等。我喜歡這些作家，首先是和當時的中學課程有關。

當時的高中文科，除了「中國語文」科，還有「中國文學」。這科的重點不在語文訓練，而在文學欣賞，因此要精讀許多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這是最喜歡的科目，而且我很幸運遇到幾位很好的中文老師，包括梁漢榮、梁世祺和陳振來老師。他們都是中文大學畢業，教學各有特色，給了我許多鼓勵和啟發。

另一個原因，是金庸、梁羽生和瓊瑤的小說，經常引用古詩詞，我很自然就被吸引進去，並愈讀愈着迷。現在回想，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李白的〈將進酒〉、王維的〈山居秋暝〉、蘇軾的〈水調歌頭〉和〈記承天寺夜遊〉、柳永的〈雨霖鈴〉，還有沈從文的〈邊城〉和周作人的〈風的話〉，都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我發覺，這些作品一旦進入你的生命，就會成為你的情感和審美結構的一部份，並在最深意義上構成你的自我。讀過唐詩和沒讀過唐詩的人，舉頭望的雖然是同一個明月，感受卻絕不一樣。好的文學和好的藝術，都有這種力量。

最後一類是歷史和思想。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我們那個時候必讀的，蔣夢麟的《西潮》在年青人中間也很普及。由於對生命困惑，我也開始閱讀《聖經》，甚至跟同學去教會聽牧師講道。

記憶所及，除了瀏覽過羅素的《哲學問題》、《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和《存在主義概論》之類，我基本上沒怎麼讀過哲學。對哲學產生興趣，是進入大學之後的事。在那個時期，我也雜亂地讀了不少和時政相關的東西，包括《爭鳴》和《九十年代》雜誌上的文章，還有劉賓雁和蘇曉康的報告文學等。

除了圖書館，要想找書讀，另一個途徑是去書店。

我去得最多的，是旺角的樂文書店和田園書屋。這兩家書店，主要售賣港台的文史哲類書，書種又多又新，是香港二樓書店的典範。旺角在學校和家中間，是我每天必經之地，放學後去書店打一會「書釘」（即只站着看，看完不買），也漸漸成了習慣。沒有書店喜歡我這類顧客，所以有時也得識趣，例如讀了半小時，便須將書放回書架，做個記號，下次接着讀。又或者實在忍不住，可以在這家讀一點，然後轉去另一家繼續。

逛書店和泡圖書館，是兩種不同的閱讀。書店是變化的流動的活潑的，每星期有新書上架，人在其中，和其他讀者擠在狹小的空間拚命吸吮新知，渾然不知時間過去，現在想起也覺美好。

除了旺角，另一個我喜歡去的地方，是鴨寮街。那個年代的鴨寮街，有兩三家專門售賣舊書的攤檔。免費收集回來的舊書，隨意擺於街上，沒有任何分類，甚麼書都有，堆積如小山。書價便宜，幾元便有一本。

那時我家就在鴨寮街旁邊，於是隔幾天就會造訪一次，彎腰伏身，像尋寶一樣在書堆左翻右查，希望找到心頭好。現在我家書架，有好些書就是當年這樣淘回，包括一套三卷馬克思的《資本論》，郭大力和王亞南譯，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二十多年過去，憶起這些年少舊事，我意識到，後來我所走的路，都和這些讀書經驗分不開。中學課本的知識，大部份我已忘記，但這些完全不為甚麼而讀的課外書，卻在不知不覺間融入生命，並在無數困頓的日子給我力量。更重要的，是在讀書過程中，閱讀本身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直到今天，逛書店打書釘淘舊書，依然是我生活的最大樂趣。

我很慶幸，我的少年時代，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讀書時光。

（2014年10月9日）